



莫斯科绅士
系统的笤帚

《莫斯科绅士》



[美] 埃默·托尔斯著 马韧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变革的年代里，被囚禁的反而成了自由的。

1922年，罗斯托夫伯爵被认定为不悔罪的贵族，被判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大都会酒店。这位此前从未工作过一天，人生要务唯有追求智慧与学识的绅士，自此只能栖身于这家五星级酒店的阁楼，以独特的视角观望俄国在历史车轮下展开的巨变。他的人生也开启了崭新篇章。神秘的女演员、古灵精怪的少女、性格各异的主厨与侍者……种种邂逅与交往，让他体会到多样、微妙又丰厚的情感。酒店这一受限的空间，却让他的精神得以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这本优美的小说充满了风趣幽默的情节、闪闪发光的人物和精致迷人的场景。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在时代的洪流中，人之为人的意义。

《我们世界的历史 1: 古典时代》



[英] J·M·罗伯茨著 陈恒等译
东方出版中心

作为一部在学术界深受好评的世界通史杰作，本书是以为专业读者为主要目标群体，旨在唤起一个普通读者去思考历史的厚重感和历史惯性在这个世界中的重要性。

这部堪称经典的的世界通史著作，自1976年出版问世以来，广受欢迎，不断重印，并根据世界局势出现的新发展、新动向，不定期进行修订和新的展望，目前已出到第六版。该书按时间序列和历史阶段特点，共分八个篇章，概述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直至21世纪的历史，突出分析了那些影响着人类发展的重大事件和进程。全书视野广阔，文字优美，对于完整理解人类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的大众读者，提供了难得的指引和阅读享受。

《我们世界的历史 1: 古典时代》是该系列的第一部。

《枕草子》



[日] 清少纳言著 周作人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枕草子》大约成书于1001年，开日本随笔文学之先河，全书分为类聚、日记、随想三大内容。类聚是受唐朝李义山《杂纂》的影响，罗列生活中不同性质与类别事物，如山、海、扫兴的事、高雅的东西等，涉及地理风貌、草木花鸟、内心情感、生活情趣等等，非常丰富地体现出作者清少纳言细腻的观察和审美趣味。日记记录了作者在官中的生活，其中有反映她与皇后藤原定子感情深笃的经历，以及她在官中生活的片断，这部分内容深蕴古典风貌，可从中了解日本平安时代皇室贵族的生活状态和品味素养。随想则是对自然与人生的随感，尤其可见作者明快、自由的生活态度。

本书是周作人“注释”版，20多万字译文中，注释篇幅占去了6万字。

《系统的笤帚》



[美]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著 何江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因为生殖器短小导致自卑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心理问题的知识分子。他疯狂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8岁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虽然身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却做着收入很低的前台接线员工作，因为她也有着无法言说的心理问题。故事中几乎没有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正常人”，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无法跨过的障碍，就像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一样，被情感、药物和沉沦包围着……作为人类，他们该如何与这个复杂的世界相处呢？

该书用理性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故事，一部令人惊讶而壮阔的美国当代文化史诗。华莱士曾说：“他的作用，就是告诉读者，身为人类这种动物，到底是他的什么滋味。”

(晓阳)

奈保尔：我只是一个观察者

本报记者 于灵歌

8月11日，维·苏·奈保尔去世，享年85岁。作为英国文坛蜚声国际的“移民三雄”之一，奈保尔出生于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裔家庭，定居伦敦后常年漫游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混杂的语言特性、宗亲的血缘疏离，在理解自身特性与洞察世界文明的平衡和摇摆中，奈保尔一步步地接近、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

逃离故乡的异乡人

1932年8月17日，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座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岛屿。奈保尔的祖父属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但也是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身份的高贵伴随着家庭生计的贫穷，成为奈保尔成长中的童年印记。

在奈保尔10岁时，他就想当个作家。研究者指出，奈保尔受到父亲影响，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偏爱。父亲西帕瑟德·奈保尔是一名记者，业余时间撰写小说，并始终怀抱作家梦。正如奈保尔笔下《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一样，书生气使得他在特立尼达当地人社区中显得格格不入，死时债务缠身，年仅47岁。

18岁时，奈保尔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奈保尔找工作时因为移民身份饱受歧视，住地下室，不得不靠妻子教书来维持生计。

直到成为BBC的广播员后，他才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于1957年发表了处女作《神秘的按摩师》。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奈保尔童年的记忆和对特立尼达生活的回忆。

然而，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自己的出生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憎恨，形容其为“深渊”，并庆幸自己并未滑落下去。“我感到十分压抑，那真是再痛苦不过了。我想逃离特立尼达岛。我能逃离它真是太

幸运了。毫无疑问，我已经治愈了我的创伤。从离开的那一刻起，我拥有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生命。”1998年，奈保尔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说。

《米格尔街》就是在这种轻快喜悦的逃离中收尾的——“离开了他们大伙儿，头也不回，轻快地走向飞机，只看着眼前自己的影子，那在跑道面上跳动的小矮子。”

在梁文道看来，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后代而产生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身份认知和焦虑，构成了他成为一位出色作家的核心。

“写作者的一半要务是发现主题，而我的问题之一是生活斑驳色杂，满是动荡和迁移。”在1984年《寻找中心》的序言里，奈保尔写道。

未受世俗侵蚀的洞察力

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是他1987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评委会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作者用文字体现了旧殖民统治文化悄然坍塌以及欧洲各邻国消亡的连续画面”，并称奈保尔的作品具有“未受世俗侵蚀的洞察力”。

对于多产的奈保尔而言，他的作品中一半是小说，一半是以游记、随笔为主的非虚构作品。有说法认为，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尤胜于他的虚构作品，在他的游记中这种洞察力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视角异常敏锐，叙述一针见血，分析不留情面。

奈保尔最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就是他三次去印度旅行、采访的产物。从1964年到1990年，他先后出版了《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创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三部作品。仅仅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印度的喜爱，以及深邃的忧思和毫不留情的批判。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达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对印度的悲苦几乎无法承受——过

去如此，现在如此。”在书中，奈保尔满怀惆怅地写道。

除了印度，奈保尔还去了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以及亚洲伊斯兰国家，写出了《自由国度》《大河湾》《信徒的国度》等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伴随着对奈保尔作品阅读面的扩大，对异族文化的涉猎，以及对奈保尔其人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对他“背对故土”的去国者、局外人姿态，以及字里行间透露的气息有了同情。

中国作家止庵认为，奈保尔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洞察世界的方式。“奈保尔曾言，去一个地方之前他不能预先有答案。他不仅要去看当地报纸，而且还要看看那边的人是怎么生活。”这种方法并不讨巧，但正如奈保尔自己曾写的：“严肃的旅行是一门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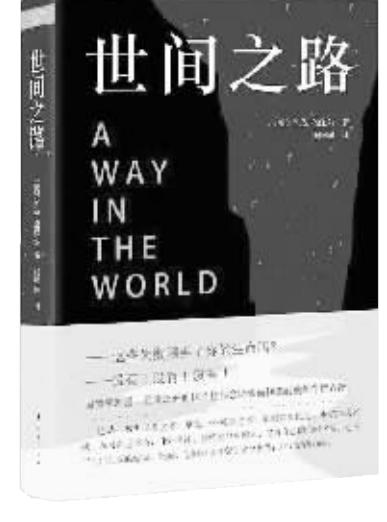
置身多文明之上的批判者

2014年8月，奈保尔曾作为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嘉宾来到中国，并度过了他82岁生日。

当时全程陪同奈保尔之行的止庵回忆，尽管那次上海之行奈保尔显得衰老，话也很少，但私下里仍然保持着文字中的敏锐。一次餐后，奈保尔给出了这样的评语：“这顿饭是很有文化的人安排的。”而他也绝对不会因受殷勤接待而贡献应酬话，那几天不少人都希望他写写中国，但奈保尔却回答“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写不了。”

止庵认为，奈保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少有的能够置身多种文明之上、同时对各种文明都有所洞察的作家。“后来的历史通常证明：他的观察和见解是对的。”

在《大河湾》中，奈保尔将视线投向了艰难地走现代化之路的非洲国家：在那里，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独立的非洲国家，并没有立即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相反，更为复杂的种族暴力冲突又兴起了，社会没有秩序，死亡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写完《大河



湾》，奈保尔宣称“非洲没有未来”。他毫不留情地说出了人们不想看到、不愿承认、更不敢说出口的真实。

正如奈保尔曾在上海之行反复提到的“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面对所有文明，他只在意讲述他眼中的真实。

“人们总觉得存在一个单独的文化区域，事实上从来没有。所有文化一直都是交融在一起的。人们总是来来往往，这个世界一直处在迁徙之中。……我也不认为我是混合文化的典型。我总是想着我的书。”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奈保尔这样说道。

奈保尔传记《世事如斯》的作者表示：“奈保尔的道德轴心不是白种欧洲文化，也不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他的道德轴心是内在的，是他自己。”

止庵说，奈保尔的作品不是描绘别处，而是处处能找到我们所在世界的影子。

“他不仅不对世界说好话，甚至就是说坏话的。但他说的坏话深刻、致命，而且有持久的生命力。对于这个世界，奈保尔不开药方，但他会指出病症。”



平凡生活的心灵悟语

——读《随心随意去生活》

刘小兵

作家、生活家、美食家、主持人，从这些名类繁多的称谓中，既可看出蔡澜的多才，也可窥见其对生活保有着怎样的一个涵养和情趣，《随心随意去生活》就是蔡澜源自于平凡生活的心灵悟语。

全书共分四个章节，文末还附有蔡澜对婚姻、道德、美食、岁月等一众话题自问自答的解读。所选篇目长短不拘，平实、诙谐构成了它的主基调。值得一提的是，蔡澜谈生活，不是从宏阔的大道理入手，而是深入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把纷繁的生活掰开了来说，在他看来，要让每一个平凡的时日过得有滋有味，首先就要端正好对生活的态度。

开篇他就以“活着，就要尽兴一点”为题，兴致盎然地畅谈了现代人该如何在忙碌的奔波之余，心怀素雅地去面对生活的多姿多彩。他凭着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言词恳切地告诫大众“生老病死，必经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还不快点去玩？”他进一步提示说“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

钱，买一些让自己悦目的日常生活用品，也不会太破费。”那么，整天沉溺于这种玩中，会不会玩物丧志？针对某些人的这种担忧和疑虑，蔡澜一语中的地告诉说，恰恰相反，拥有琴棋书画这类高雅的兴趣爱好，则不但不会丧志，相反还会养志。

接着，他又从做自己喜欢的事，便是幸福的深切感悟中，分享了过平凡日子的舒心和甜蜜。生活就如一个万花筒，盛载着斑斓的光影，也寄寓着芸芸众生的梦想和荣光，它悄然绽放在时光的深处，幻化成一幅幅妙不可言的流动光景，仿佛在昭示着我们，人生路上，总要经历一些坎坷和沧桑，才会在宠辱不惊中变得从容，在静水深流中体会到生活的厚重。

毋庸讳言，吃是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蔡澜笔下，吃与玩乐一样，不但充盈着一种情趣，而且还是一门生活的艺术。他快意地认为，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蔡澜风趣地写道“真正会吃的人，是不胖的。”书中，蔡澜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各类美食的垂爱。盛赞会喝酒的人，都不老；有品味的人，都喜欢喝白兰地……有意思的是，蔡澜在品尝美食时，不仅爱沉缅其间，吃得津津有味，还喜欢静观他人对待美食的态度。那些形色各异的吃相，那些觥筹交错间的言谈，那些相互挤兑中的闹剧，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人们的秉性、教养和对待生活的灼见。寻常的吃，经蔡澜这么一点拨，不光有了色生香的感官诱人，还以其妙趣横生的智慧引领，顿时让人变得心旷而神怡。

令人深思的是，蔡澜在吃上推崇有品味有节制的“大吃大喝”，但在如何随心随意过好生活上，却鲜明地表达了“懂得与放下，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观点。书中，他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多年的用心思考，意味深长地展开了这样的论述，所谓懂得，就是要谈看名利和荣誉，把金钱地位切切实实地当成是身外之物，明白了这一点，才是真懂得。而放下，就是要把这些袭扰我们内心的身外之物果断的予以卸下，须知，精神上的健康，比一切都重要。而做到了这一点，方是真放下。

《随心随意去生活》完全颠覆了对有关人生的传统认识，让平凡的人生变得光艳无比。还是蔡澜说得对：“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别人，不听管束，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一点也不复杂。”

本上摘抄句子，看着一个个字在我手下成型，也是莫大的满足！

我总觉得“线装书”是一种不施粉黛的清苦书，它身体里隐藏着一种古旧风雅式的味道和乡野式的洁净与通透。著名学者邓云乡在谈到线装书时说：“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首先在于它的载体线装书，没有线装书，无处看线装书，不会看线装书，那就差不多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

中国线装书局总编辑谢云先生也曾说：“线装书装帧形式传递着古色古香、浓厚典雅的文化气息，所以在现代依然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线装书的魅力可见一斑。

如今，我们曾经的“线装书”已逐渐远离了视线，但我对它的印象却是难以磨灭的，那里有字词和纸张的魂魄、呼吸、呢喃、神采，那是岁月给予我的最美情书……

带着疑问 读历史

唐宝民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大多数读者，在阅读史书时，只是一味地顺着作者的思路走，对于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不敢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读书时只用眼睛、不用脑子，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只有带着疑问去阅读历史，才能得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才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

提起张燧，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确，在史料中，张燧这个人留下的资料特别少。张燧是明代的一个作家，说他是历史学家，也不为过。我在读他的《千年百眼》一书时，惊讶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这本书，是他的一部史论随笔集，其可贵之处在于，面对史书上很多已成定论的东西，他都不盲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大胆怀疑，客观分析，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史记》这本书被史学研究者奉为圭臬，但张燧在通读《史记》后，却认为《史记》中的部分内容，并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而是后人添加上的，“我又考证了《后汉书·杨终传》，说是‘宋宗时期，杨终受诏《太史公书》后删了十几万字’，那么，可知现在的《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原书，难怪它杂乱不一”，关于清谈一事，史家公议是始于晋朝，但张燧却认为清谈在汉末就已经出现了，他举例说：“仲长统《见志诗》上说：‘寄托愁闷在天上，埋葬忧愁在地上，反叛五经离开道，风雅一起消灭了。’郑玄喜欢喝酒，临死前对同僚说，‘一定要把我埋葬在制造陶器的地方，差不多百年之后化为尘土，有可能被我取去做酒壶，这才符合我的心愿。’”张燧由此断定：“这二位原来是阮籍、刘伶的先行者。”类似这样的观点，他提出来很多，如：“曹操不是复姓”“刘知几没有写史的才能”“秦国的强大不在于孟明”等，都颇有见地，发人深思。

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个带着疑问读史的学者，近读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发现他对很多史料，都不轻信，而是要亲自考证一番，从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来。例如，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的字样，因此，历来研究者认为，桃花源的所在地，当在武陵，而先世所避的“秦时战乱”，应为秦朝末年的战乱。

但陈寅恪先生经过考证，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是南方的武陵”，那么，陶渊明为什么把地点写成武陵呢？陈寅恪先生认为：“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用了刘驥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连乘刘驥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开卷有疑”是一种治学态度，能让我们在比较和疑问中感受读书的乐趣与意义，收获到货真价实的知识。带着疑问读历史，是一种独立思考的阅读行为，能让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走得更远、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不一样的杜甫

黄颖

读完康震的《评说诗圣杜甫》有点颠覆以往的认知，那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形象，在心中则更加地有了烟火气息。

食“人间烟火”的诗人。公元746年，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政治理想的杜甫来到长安准备经由科举入仕途，结果这次考试给了杜甫以沉重的打击。在权贵相交的时代，为求得政治上的成功，诗人也不能免俗于权贵。诗人不断地寻求政治上的帮助，希望通过结交权贵而得到援手。

公元750年唐玄宗准备将太清宫与太庙的祭祀活动放在一起举行，但这种混合祭祀的方式并不符合封建祭祀典礼的常规。但杜甫却挥笔写下三篇吹捧玄宗祭祀活动的大赋，其实这三篇只是歌功颂德的陈词滥调，杜甫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此举能够引起皇帝重视，以某得一官半职。